
夏康農著

論胡適與張君勱

本書據新知書店1948年版影印

小序

中國大地之上正經歷着我們自己歷史上空前未有的規模的內戰，報紙上驚心動魄的標題卻重複不斷地刊載着「美援」的大字。這對比在後世的子孫不知將發生什麼感慨，對於當前在這一片土地上呼吸蠕動着的同族人們，該是多麼沉重的一份負擔！是神還是鬼，是天堂還是地獄，對於這個民族和他的土地，都得出這一場戰爭裏判分。

就在這大戰初露迹象的時候，上海的言論界曾經翻騰過一陣急迫搶救的熱忱。我也辭和在這一陣裏寫了些須文字。生活既然決定我只能作點這樣的事情，也就這麼作了，聊破當時一己的枯寂。其中有的接觸到我留心過的人物，時代替他們蓋下了一份不光明的行狀，他們偏就是我們文化界的「清流」。由於着筆時處於民族大禍的難求倖免，我寫來也就犯了「世故」的大忌，不能「對事不對人」，而卻從人身上看事。「察淵魚者不祥」，也就顧不了許多了。

其實像這樣的人物和這樣的事，能說出比我說得更妥貼的，何只千百人！我無非整理了

一下和偶爾來訪的青年們的談話，移到紙上而已。從青年們感覺到這種文字也還有點用處，我這樣覺到自己已經并不年輕。

這裏集納起來的這兩篇，就是在這種生活情況之下寫出來的。今天事隔一年多，胡適之張君勛兩位博士的作風，仍然依照他們的邏輯推演。尤其胡博士，宣佈了他「過河卒子」的誓辭以後，捨不得收斂他的毒性，只恨中國不能一下子全盤奉獻給他心頭「景仰」的宗主國家。他能够以美國豪門之心爲心，有意抹殺自己民族的災難，睜起眼睛看住美國豪門的仇家。年來對自己的事情，他說過「和比戰還要難」，意思是要借侵略者的刀鋒殺盡一切忠於民族的同類。對外的問題，他發表過給周鯨生校長的一封信，說他從此不能再認蘇聯作朋友，意思是蘇聯的存在妨礙了美國的擴張。甘心事大，爲虎作倀，知識份子并不正面問政而喪失了民族氣節到了胡博士這樣的田地，此人真算够突出的人物了！

這并不是「歷史的偶然」，這是中國歷史新頁的必有醜態。這是美國型侵略作風藉重文化侵略政策的必然發展。尤其美國在十九世紀後半，自己受了一場南北戰爭的頓挫，再來中國時，中國已經數國國際衆多侵略勢力劃分範圍到不留餘地的情形之下，它的對華侵略，只能採用狼蒙羊皮的文化方式。庚子賠款的「退還」，它首先示「惠」，備用於對華文化事業；這案子在美國國會通過，到今天剛好四十年了，這新型的巨大「歇洛克」該到了大量收取

「肉祭」的時候了。胡博士「義」不容辭，半生來總沒有忘記「遺債」的說教，今天更挺身以第一號「肉祭」自許，貢獻他的全部心力了。

這就難怪乎胡博士以一名白面書生的身份，偏能風來前幾天幾乎受到神讀「大寶」的消息，也難怪乎這個消息剛一發佈，太平洋彼岸的報紙（例如紐約先鋒論壇），立刻就給回一陣歡呼的彩聲。

我在前年冬季全國抗暴聲中寫下的文字，只能約略估計到像這樣的發展。「今朝都到眼前來」，文化！文化！竟成爲這可咀咒的名辭！當時我還不會揭舉胡博士的恩師「杜威博士」原本就是美國對華文化侵略政策的僕役之一人，他之一度來華「講學」，根本就負有輕輕的使命。此人回國後的寫作，正如胡博士所說，時常「關切」到中國的事情。要用「杜威博士」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這樣的形式：

「我們對中國的關切不是經濟的，而是父母對兒女的那種關切。……父母也希望將來得到兒女的幫助，但是期望經濟的利益并不是父母感情中的精髓。」（見所著「美國與遠東」一文，一九二六。）

如果今天有人以爲稱呼某其有了「美國爸爸」就算是一種侮辱，對照着這位「大思想家」的言論來看，那可是犯了絕大的錯誤，美國有不少人早就以「爸爸」的身份對待中國人

了，——至少對於像胡適博士代表的類型人物還是千真萬妥的。

所以，今天還值得大家多多認識這樣的類型，尤其值得進一步研究美國對華文化侵略的歷史全貌，我這舊稿的重印，也出於側面補充這種研究的一點微意。

至於張君勸博士，他久矣放棄了他的文化生涯，而是一名「民主」的黨魁。雖然他最近從新大陸「講學」歸來；但是既然連新聞記者都感覺不出報導的興趣，我們也就從簡不談了。

胡張兩位博士在思想上以及對於「文化」的看法上，本來是居於背道而馳的兩極；今天在政治行動上他們可是沆瀣一氣，融和無間。這件事本身，就是那思想文化的性質的最好說明。兩博士一位已經是「製憲」專家，一位可能是將來「行憲」的大吏，此地兩「賢」令傳，應當是一件「美」談。

以上就是集結這冊小書的理由，爲了情趣的改變，我改易了兩文舊稿的冗長標題。

夏 康 農

卅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目次

小序

論胡適

一 前言.....一

二 論其人的特性和通性並勾畫輪廓.....六

三 「拿證據來！」.....一一

四 結論.....四四

論張君勱

一 破題.....四九

二 起講.....五四

三 尾聲.....六六

論胡適

一 前言

我以下列兩點理由着手寫這篇文字：——

一、胡適博士（這是美國文獻裏習慣尊稱胡先生爲「Dr. Hu Shih」的中文翻譯，是爲了尊重胡先生盛名的來源而採用，別無他意。）和他所能支配，影響的中國一部份社會力量，對於中國的進步曾經有所貢獻，其中至今也還包含有可尊敬的學術中人。但是胡博士本人却過於看重了自身——就是胡博士論「不朽」中的「小我」——的利益，以至於不惜蒙混是非，顛倒黑白，損傷了學人的尊嚴，妨礙到大家所託命的公同社會——就是論「不朽」中的「大我」——的進步與發展。這情形已經有不少年了；胡博士爲了這個也已經背負了不少年的責難與輕蔑。隨着災難中的中國生命的推演，到今天更際遇着胡博士的這個不良慣性可以發揮更妨害「大我」生活的影響，所以值得論列。

二、這第二點也可以說是第一點理由的引伸或註解。

胡博士雖然不治自然科學，但他很尊重自然科學的。首先，他的「哲學」（假如算他有哲學的話）據他說是最得力於赫胥黎和杜威（「胡適論學近著」頁六三一，商務版），而赫胥黎是生物學家，至於杜威呢，「杜威受了近世生物進化論的影響最大，所以他的哲學完全帶着生物進化學說的意義。」（「胡適文存」第一集頁四四七，亞東版）可見得這「哲學」和自然科學的關係。又於胡博士主持教育行政的作風中，他可以對於新聘的同等資歷同等造詣的教授作分別等級的待遇，理學院的每每高於文學院的一級或兩級，更見出他推重自然科學的苦心，雖然不免有點委屈了他自己的本行。再如他對於世界自然科學家中有經特別推薦過微生物學家巴斯德，為此作過幾次演講。

所以，他一生諄諄教誨後生要「科學態度」，尤其立論要有「科學根據」，這就引入了我的第二點理由的正題。就在巴斯德創立的微生物學領域內，近年來發現了新的事實，叫作「細菌移殖的漸進的毒性」。若干細菌學家實驗的結果，發現細菌的毒性可以變異，本來對於某種實驗動物無毒的細菌，經過輾轉移殖以後，可以變為有毒，而且愈經移殖毒性愈增強。例如，最普通的鏈球菌（*Streptococcus hypervirulentus*）對於一隻兔子的毒性並不太強，需要注射一立方厘米分量的菌苗，才能生效。可是經過次第移殖的手續，毒性可以增進

到只須一百萬分之一立方厘米的菌液注射就能殺死一隻約三公斤重的健康的兔子，（這是 Marmorek 教授的研究報告）

假使我們都和胡博士一樣地尊重科學，那麼，照我在第一點理由裏所說，胡博士之於中國，從前不只無害而且也作過點有益的事情，正如本來無毒的細菌一樣。（請讀者不要覺得這比擬刺眼，而要打起精神來看，這是爲了「科學的尊嚴」！）可是隨着中國現代歷史的推動，也就彷彿細菌的移殖一樣，胡博士可就逐漸變得對於中國有害，而且愈變其有害性愈強。例如，會激起全國憤怒的美國兵對北大一女學生橫施強暴的事件，胡博士就可以輕描淡寫地說「這只是單純的法律問題」，而且隱瞞着自己的政治偏向，希望學生不作政治聯想。甚至對於法律問題，他又不說明究竟應當算是中國的法律問題，抑或應當算是美國的法律問題？難道中國法律上竟載着關於美國駐軍強姦中國女子的條文麼？還是美國法律上載着關於美國征服「友邦」的逮捕軍人強姦那「友邦」的女子的條文呢？這種自應隱瞞，就至於含糊躲閃，曲祖外來強暴的說法，胡博士在從前是還決不肯出口的。豈只不肯出口，而且一定會和今天絕大多數的國人一樣，憤不可遏的。這證據就見於載在「胡適文存」第一集第四冊裏面的「李超傳」。李超是當年北京女子高師的學生，爲了逃避婚姻，經歷了一串困難，至於以病以死。這在今天該是好稀淡平常的事情，當年可引起胡博士的大篇文章。他說：「她本

來體質不强，又事事不能如她的心願，故容易致病……後來病更重，……遂死在法國醫院」（「文存」一集頁一〇七八）「李超傳」的結尾還有這樣的話：「我幹這一個素不相識的可憐女子作傳，竟做了六七千字，要算中國傳記裏一篇長傳。……可以用做無數中國的女子寫照，……可以算作中國女權史上的一個重要犧牲者……」（「文存」一集頁一〇九二）胡博士在當年「李超女士追悼會」裏的沉痛致辭，我現在耳畔都還能彷彿一二呢。

從當年的李超小姐到今天的沈崇小姐受到的胡博士的不同的看待上，不只可以看出兩個時代的青年對胡博士自然會有如何不同的反應，而且也是胡博士「移植的毒性」的最好的說明。昔日的胡博士勉勵青年奮發向上，今天他却只許青年萎靡畏葸。這不只是一般常情的年齡的影響，還與他本來的氣質有關，是屬於可能有毒的那一類，經了時代的移植，毒性就愈趨愈強了。

爲了這一點「科學」的理由，我按捺着感情竟浪費了這一大堆筆墨，抄錄些在今天了無意義的文字，原因就是彷彿胡博士的所謂「科學態度」，「拿證據來」，好讓今天還迷信胡博士的人們看看。實際上，人類社會現象比細菌社會現象自有更複雜的規律，照搬正的科學態度說來，這種「人本主義」（Anthropocentrism）式的附會科學，是並不足爲訓的。然而胡博士談思想就可以這麼圖圖其辭。例如他可以說：生物界的現象原來是複雜而且點滴

進化的，所以人類現象也是複雜而且點滴進化的。（「胡適論學近著」頁六一三的大意，下文再論。）

歸根結蒂來說，我的意思不過是做下面的要點：

自從中國舊社會漸趨解體，而一直還不曾建立起健康自主的新社會以來，知識份子中稍能以學術自見的，（除去篇於所學與所信謹慎自處的以外）大抵不憚擺脫不掉「學而優則仕」的老病根，而且還墮落到失去了舊時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更沒有爭取現代民主政黨政治的勇氣，而不過只喜歡抱着學術的琵琶，笑媚權要，從而討點鄙俗的自滿。笑媚的撒弄可以多姿，權要的性質也可以不問，甚至於不問它是同族抑或異族！所以嚴幾道可以為袁世凱「籌安」，周作人可以為日本「總監」教育。胡博士今天正臨着這相同的險關，尤其是在這美國獨佔性資本家集團還不肯放棄以軍事經濟的變重威力迫使中國甘作附庸的政策的時候。胡博士未必承認這是「險關」；然而對於不能接受這個政策的中國人却決不能忍受胡博士可能做出比嚴幾道，比周作人還更技巧，更積極的表演。

所以，我們今天值得清理清理胡適博士的脈絡。

「註」這 Anthropocentrism 是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期歐洲生物學界易犯的一種不科學的傾向，動輒喜歡輕率地取生物界的現象與人類現象類比，說明生物學研究初從經院派哲學裏感化的思想

痕跡；與後來哲學上的Humanism並非一事。至於有些哲學家如柏格森，如杜里軒等則竟從某些生物現象作整個哲學思想發揮的根據，那就純屬哲學範圍了。

二 論其人的特性和通性，並勾畫輪廓

清理胡博士的脈絡，在今天已經不是一件愉快的工作。第一，作為學術文化領域中一位學者來說，胡博士的著作等身，其中除去專門性質的中國哲學史以及古籍考證以外，大抵都流露著一種「孔雀開屏」體的風格，炫耀之氣撲鼻；不是一再申述「……覺得我總算不曾做過一篇潦草不用氣力的文章，總算不曾說過一句我自己不深信的話」（「文存」一集二集自序），就是「……還積下這五十萬字的散文，合計也有一百多萬字，總算還有點成績了。」（「文存」三集自序）甚至於就專門性質之作，論中國哲學史，他說是旁人休想逃出他的掌心，意思是必見其大；而一般古籍的研究却又以「一點一滴」為最高的真理，而且還是「這一種實驗主義的態度在各方面的應用」（「文存」二集，卷三，頁一〇〇），而且「考訂一個古字的真偽，其價值不在天文學家發現一顆天王星以下」（這是齊物論的翻版，却不是科學）。胡博士論梁漱溟氏的哲學時曾招來葉氏致書中有「尊文間或語近刻薄，頗失雅度」之譏。論張君勱氏的哲學則「我戀住了這翻過來的一截，仔細一看，原來他仍舊不會跳出葉先

生和邏輯先生的手心裏！」（均見「文存」二集卷二）至於他初期盛名之下，曾經請過梁任公批評他的中國哲學史，而會後在講堂裏竟能對學生說出這樣的話：「梁啟超的批評，混賬之至！有的同學說要打他——我看那個也可以不必。」總之，作為學者來說，胡博士的態度並不「科學」，意氣的排他性極強。這不只是他尊重的美國的杜威和中國的機學家所不屑為，寧近於中國文人相輕的舊習，而那歸骨的自炫與排他，甚至於以用產多少字數作為治學的成績，倒使人嗅出工商業高度發達的國家裏面商標廣告的氣息。這就牽聯到——

第二點不愉快的事。像胡博士這樣氣質的學人，必不甘以學術自了；而作為立言論政，立身行事，乃至「政治只是我的一種忍不住的新努力」（「文存」二集，卷三，頁一〇〇）這一方面來說，他却墮入了我本文第一節裏的兩點理由之內，為了自己的利益，惡化社會的影響。一方面，他宣說：「如果把政治劃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懶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文存」二集，卷三，頁一〇〇），道出他是喜歡文化與政治雙管齊下地努力的。另一方面，儘管他口頭推崇易卜生主義的「世界上最強有力的人，就是那孤立的人！」實生活上却總在那裏標榜同氣，不問主張，但有橫門可傍，只須「弟兄們」辭的猶如何求售，不計其他。這種文化中人不負政治責任而必須問政的「獨立精神」，多年來用現在中國的政治商場，充分反映出不幸的中國的不幸文化。這種解釋無需乎牽聯上胡博士口頭上

推崇的自然科學，倒是近代進步的社會科學很容易加以說明：從內外雙重壓迫中推動着中國社會，上層知識份子大抵依附着少數階級的統治者奔走勞心；留學生們尤其便於自私，儘管多少還保有學術的興趣，總難有趨赴再造中國的勇氣。胡博士是更標準的代表，說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度裏面現象之一例而已。他們最好標榜獨立與清高，這種「獨立」的表現，就不只單從正面擺出那醜陋的「孔雀開屏」，而自然也就有時陳設出「錦屏」後面那排糞的肛門來了。

清理出胡博士治學，立言，以及作人的特性與通性以後，我現在想先勾畫出他的脈絡的輪廓：——

胡博士的年齡沒有趕上滿族朝廷的科舉取士，十四歲從動盪不安的故鄉到了上海洋場來求「新學」。「從十四歲到十九歲的六年之中——一個人最重要最容易感化的時期——受了時報的許多好影響。」（「文存」二集，卷三，頁五）這時又承戊戌政變失敗之後，正梁啟超氏解放文體論政論新學的文字風靡若干年，像胡博士那樣改良主義氣質的知識青年，自就容易接受這些不肯根本反抗現狀而只點滴修正愈趨愈惡的思想。地下革命的孫中山，一直不會引起他們的注意，那是必然的事。不久，美國留華老傳教士 G. G. 牧師向美國老羅斯福總統建議退還中國庚子賠款，「拯救中國靈魂」招收中國學生留美的計劃實現，還方興未艾

的新型資本主義國家的「攻心」政策自來就比甲午戰爭擊敗中國那種「以力服人」者高明。胡博士得到機會留學美國，這就培植了他一生業績的基礎。

留美求學生涯中所學幾經改換，由農業而經濟學，由經濟學而哲學。據胡博士未發表的一部份藏書室筆記裏所載，這時期這位關心國事的青年留學生願望回國後能以梁啟超氏那樣的新聞記者自見（這是胡博士回國後不久在北平允許他姪兒，思永給我看的文字，當時是很興奮的讀物，我今天的印象只記得略存疑問，何以胡博士留學時期欣羨的人，回國後反而有點鄙夷他？）。由於中美兩國國情的懸殊，胡博士一方面對於美國社會的一切作無批評地接受，一方面又留有中國舊時典籍的根底，對於中國的文學與哲學更感興趣。所以他對美國人論「先秦名學史」而一回中國就講詹姆士杜威的實驗主義。這種兩邊不接頭，兩邊好賣弄的「文化」作風，幾乎是二三十年來許多留學生們登龍秘訣的第一個條。胡博士不過是其中一例而已。

他「學成」回國正當中國舊文化裏陶鑄出來的兩位卓越代表人蔡子民、陳仲甫兩先生輝煌事業發軔的時期，兩先生又都給胡博士以增進與揚掖，三四年期間胡博士頓成中國文化界的新寵。這時期又當歐戰及其後的疲敝，西方帝國主義者無暇高力箝制中國，中國開明的上層社會普遍有了變換的要求，胡博士在蔡陳兩先生旗幟之下以方興的銳氣着實盡了一番描繪

封建舊文化的文字之勞。然而淺嘗即止的胡博士，氣量既不能如蔡先生的「兼容並包」，改革的要求又不像初期陳先生的熱忱勇毅，所以在蔡先生不容於北洋軍閥，陳先生倡導社會主義革命以後，胡博士就開始「維持既得的權益」，集合他自己同臭味的朋友（也就是大家盛說「我的朋友胡適之」的時代）推行他的一套作風。誠如胡博士所說：「社會往往太慷慨了，往往期許太高了」；從此胡博士傾向於惡勢力的保守，大家看見他混沌了新舊的陣容，連談「主義」都得受他惡毒的嘲笑了。胡博士的朋友圈子慢慢也就擴充到英美外交官和新聞記者羣了。「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的爛調慢慢也掛上了胡博士的嘴角了。並且連在民國十一年的十月，他就「老實說，現在中國已沒有很大的國際侵略的危險了」（「文存」二集，卷三，頁一二八，旁邊還加附圈）。王寵惠博士組織的就算「好人政府」，段琪瑞的善後會議，也可以算是政治發展的正途，應當參加了。

待到國民革命軍北伐的震動，胡博士更厭惡了護主義的人們，跑了一趟歐洲，曾經和他的朋友們計劃過阻撓。北伐「成功」，不料情形反而更好，所以他的「人權」之論，「任何政府却有權消滅要反抗它的人」了。

胡博士聲譽更隆，交結的英美朋友更多了，太平洋兩岸的大事胡博士都有權在太平洋學會發言了，教他從何感覺到世界上有什麼「帝國主義」？